

政治的回归

(美) 查特尔·墨菲 著

王恒 臧佩洪 译

臧佩洪 审校

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中，
不可能再有一种实质性的
统一体，我们必须把
分化认定为构成性的，
它是一个已变成失控的
冒险舞台的社会。



主编 吴 源
策划 佘江涛

江苏人民出版社

前言

这本书收集了我在过去五年中所写的九篇论文。其中有一些已经发表过了，大部分是刊于合订本上的；另一些则是提交给会议的论文。最后一篇“政治学以及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是专为本书撰写的。

所有这些论文都是对同一些论题从不同侧面所进行的讨论：如激进民主、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共同体等。对于它们，我在这里都采取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视角。

赋予本书以统一性的中心主题是对政治（the political）以及权力和对抗的不可根除的特征进行反思。我竭力想说明这种反思对于批判当前理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自由话语的意义，同时，我还想根据“激进的和多元化的民主”来重新勾画左派的方案。

因为这些文章是为不同的对象写作的，有必要在不同的文本中提些相同的论点，所以明显有大量的重复。然而，我还是决定原封不动地重印它们，因为我认为那些重复表述的部分正是最为重要的。

这里有一些论文是我在作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一名成员（1988-1989）和康奈尔大学人文协会的一名高级会员（1989-1990）时的研究成果。在此，我十分感谢这两个机构的帮助。

目 录

前 言.....1

导 论 一种竞争性的多元主义.....1

第 一 章 激进民主：现代抑或后现代？.....10

第 二 章 美国自由主义及其社群主义批评者.....25

第 三 章 罗尔斯：没有政治学的政治哲学.....45

第 四 章 民主的公民身份与政治共同体.....67

第 五 章 女权主义，公民身份与激进民主政治学.....84

第 六 章 向自由社会主义前进.....103

第 七 章 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结合点.....116

第 八 章 多元主义和现代民主：以卡尔·施密特为例.....133

第 九 章 政治学以及自由主义的局限性.....154

注 释.....176

唉，可怜的众生，不幸的人们，
你恰恰降生于冲突和痛苦之中。
——恩培多克勒

导论：一种竞争性的多元主义

骗子在有些事情上是不会自我欺骗的，这些事情就像自欺的大海中的一些小岛，能护住它们而不使其淹没实在是人类的造化。

——艾里亚斯·卡内提*

1

不久前，在一片喧嚣声中我们被告知自由民主已经取胜，历史已经终结。可是，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远没有产生向多元的民主的平稳转变，在许多地方似乎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新的对抗的出现。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他们原以为这些只属于一个过去了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排他主义的

* 艾里亚斯·卡内提（1905-），德国作家，曾获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

在其乐观的预测遭到如此令人吃惊而又使人信服的反驳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反应是——认为这些都是极权主义的滞后效应和“落伍者”的沉渣泛起。他们似乎认为这些不过是最终必然导向自由民主的普遍化道路上的短暂耽搁——合理性重振雄威前的一个小插曲，或者只是政治在其注定要被法律和普遍理性的力量击溃前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哭喊。

这是因为政治确实正危若累卵，也确实有消亡的可能性。而且，自由思想在把握政治的本质上的无能，加上对抗的不可化约的特征，这一切正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大多数政治理论家是软弱无能的——在一个发生着深刻的政治变迁的时代，这种无能将可能对民主政治学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2

我认为，对政治的这种逃避可能危害民主革命来之不易的胜利，因此，在本书收集的这些文章中，我与大量充斥于当今民主思考中的这种政治学观念展开了争论。这种观念被刻画成理性主义的、普遍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我以为它的主要缺陷，一是它必然看不到政治在其冲突／决定的理论维度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二是它不能看出对抗在社会生活中的建构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隐，一种以为我们最终将无需对抗观念的幻觉流散甚广。这种观念充满危险，因为它将使对抗以无法辨认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我们无能为力。

这种自由的梦幻非常需要矫正，为此，我在书中与卡尔·施密特展开了争论。在我看来，施密特对自由民主的批评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但我也认为，通过揭露自由主义的不足，他能——无意地——帮助我们对必需提出的争论加以鉴别，从而更

好地理解现代民主的本质。我的目的是与施密特一起思考，反对他，并且用他的洞察力来加强自由民主，以抵制他的批评。施密特使我们注意到了敌-我关系在政治学中的中心地位，由此我们才意识到和人与人的敌对因素的存在相关联的政治这一维。它可能采用许多种形式并且会以截然不同的社会关系类型表现自己。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我曾试图在当代本质主义批判的框架内重新系统地阐述它，我的目的是利用此框架去建构多元民主最有成效的理论方法。

只有当我们承认每一个身份都是相对的，而且它们的存在条件表明了我们对差异的确证和对“他者”的确定——这将有助于一个“构成性的外部世界”的形成——时，我们才有可能理解诸多对抗是如何出现的。在群体身份鉴别的领域——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界定一个“他们”来创设一个“我们”——中，这种我们／他们关系总是有可能转变为朋友／敌人类型；换句话说，依施密特对这个范畴的理解，它总是有可能变成为政治的。当他者——此前一直是仅仅在一种差异的模式中被认识——开始被理解为是对我们身份的否定，是使我们自己的存在成为问题的人时，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从这个时刻以后，任何一种我们／他们关系类型，无论是宗教的、种族的、民族国家的、经济的或是其他的，都成了政治对抗的场所。

结论是，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这样一种政治观点与自由思想是有着深刻的矛盾的，而这可以精确地说明为什么这种自由思想在面对多种多样的敌意现象时会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特别明显地表现为它无法理解政治运动，只是将其作为所谓“大众”的表达。由于它们不可能从个人主义的意义得到理解，这些运动就经常被贬斥为病态的行动、或被

认为是非理性力量的宣泄。举例来说，自由理论家们同法西斯主义现象的妥协就是其无能的一个证据。

在21世纪的前夕，我们的社会正深刻地经历着它们各自群体身份的再定义过程，也经验着新的政治界线的建立。这与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民主／专制主义对立的消失相关联——二战后，这种对立为鉴别敌友提供了主要的政治界线。它的消失使我们面临一种双重处境：

1. 在苏东共产党集团中，在反对苏东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统一战线已经消散；而随着旧有的对抗（种族的、国家的、宗教的等等）的复活，朋友／敌人的界线正大量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

2. 在西方，正是民主自身的身份极有问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依赖构成其否定反面的苏东共产主义“他者”的存在而存在的。既然“敌人”已被打败，那么民主自身的意义就变得模糊了，它需要随着新界线的出现而被重新定义。与激进右派相比，这对于温和的右派和左派要困难得多。因为激进右派已经找到了它的敌人，他们是从“内部的敌人”——移民——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极右派运动都把他们看成是对“真正的”欧洲人的文化身份和国家主权的一种威胁。我认为，只有在政治身份发生深刻危机的语境中才能理解欧洲一些国家极右势力的增长；在政治学丧失了那些传统的标记以后，自由民主就面临这种危机了。因此必须重新描绘敌人与朋友的政治界线。

我们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自由主义理解政治的无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有那些相信随着共产主义的衰落、多元的民主必将建立，相信老对手的消解只能预示民主的一次巨大进步的人都很难理解新形势的特征。因此，要抛弃那种妨碍我们理解当前任务本质的理论视角，这一点至关重要。

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adversary）的区分之上。在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中，它要求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将攻击他的观念，但我们却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敌人”这个范畴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置换了；它还是可以贴切地用在那些不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并因此将自己逐出政治共同体的那些人身上。

自由民主要求在游戏规则上具有一致性，但它也提倡围绕清晰的社会分层设立群体身份，也需要有在现实的可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的可能。这种“竞争性的多元主义”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我们应该意识到它所体现的正是现代民主得以存在的条件，而不是一种威胁。

N. 卢曼已经证明，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自由民主的特性是“极点的爆裂”，即区分出了政府及其对立面。其阐释如下：“这预设一种相应的二元对立的纲领，例如：保守的／进步的、或者——因前者不再有效——紧缩的／扩大的福利国家政策，或者——如果经济不允许——生态的／经济的优先权。政治进程可能的发展方向只有用这种方式加以选择。”^①这意味着时下在

左、右政治界线上的含混是有害于民主政治学的，因为它妨碍明确的政治身份的设立。而这随之又促成对政党的背离，并有损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结果是以宗教的、民族国家的、种族的身份认定形式为主的群体身份的增长。

正如施密特所指出，这进一步证明对抗可以有多种形式，认为它们终究可以被消除的想法是一种幻觉。在这些情况下，最好是在一个多元的民主体系内部给它们一个政治的宣泄口。精确地说，自由民主的伟大力量就在于——让我们与施密特同行——它提供了制度和惯例，如果能恰当地加以理解的话，它们就会将敌对因素的潜在破坏消解于无形。确实，正如艾里亚斯·卡内提在《人群与权力》所显示的那样，议会系统利用了争斗者们的心理结构，因而应该被构想为一场争斗，但竞争的党派不再彼此杀戮而是接受取胜的多数派的定论。作者的描述是：“实际的投票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刻双方是在真正地较量。在此致命的最初冲撞之后就是以各种形式上演的一切：恐吓、谩骂直至抛掷杂物、拳脚相加。但是统计票数结束了战斗。”②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这也就表明政党能够在给社会各方面以及各种意志冲突以表达机会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他们的工作失败，冲突就将采取其他的外观，再要民主地管理它们就会更加困难。

应该认识到，除了对“反政治”的诉求之外，幻想众口一词对于民主也是致命的，因此必须被放弃。政治界线的缺失绝不是政治成熟的标志，只是一种会危害民主的空虚的征兆，因为这种空虚会给极右派提供一个振振有辞地表明其新的反民主的政治身份的舞台。借以界定身份的民主的政治斗争一旦空缺，就会

有另类的界定方式（关涉种族的、民族国家的、宗教的本质），其反对者也以同样的另类方式被界定。在这种情况下，反对者就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位竞争对手，而只能被当作一个有待消灭的敌人。这正是多元主义民主所必须加以防范的，而要避免此类情形就只有承认政治的自然本性而不是去否认它的存在。

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被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民主远非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它还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难以达成的东西，决不能想当然。它总是一种脆弱的征服，不仅要深化而且还需要保护。并没有一个一旦到达就可以保证其继续存在下去的民主的人口。民主的危险不仅出现在它所体现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同和效忠的时候，当它的竞争性的动力被明显太多的一致性所限制时，民主也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常常是掩盖着令人不安的冷漠的假象。其“下层阶级”（underclass）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实际上被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的那样一些群体的完全边缘化现象的增多也威胁着民主。

当——就像现今这样——自由民主日益与“实际存在着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相同一的时候，当它的政治维度被限制在法律条文上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被排斥在外的可能加入原教旨主义运动，或者被吸引到反自由的、民粹主义的民主形式中去。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一旦缺少这些，它就会轻易地被不可谈判的道德价值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之间的敌对状况所取代。

目前，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界线，从而给

民主的发展一个真正的推动力。我认为这就要求重新界定左派，使反抗依附的众多斗争都能得到一个描述的空间。在此，激进的民主公民身份是一个关键，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身份鉴别的形式，从而使诸多不同的民主斗争能有一个共通的政治同一性。正如我在下面的几篇文章中所讨论的，左派目前做了许多努力，力求揭示公民身份的理念，但是重要的是，这不能以建立一种适合于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的中性公民身份观念为目的。所以，我一方面关注社群主义对自由的个人主义批判，另一方面也对社群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保持着警惕。在我看来，它对多元主义的拒斥和对作为实质性理念的“共同善”的捍卫表现了对不可避免的对抗的另一种逃避方式。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总是会有相互竞争的诠释，对自由和平等的含义的争执也永不会停息。公民身份对于民主政治学来说至关重要，但一个现代的民主理论必须给我们作为公民的身份的各种竞争性观念留下空间。

本书从不同角度寻求发展我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③一书中提出的“激进多元民主”规划的诸多方面。在强调多元主义理念在现代民主中的核心地位时，我意识到后者对自由传统的倚重。虽然我的主题之一是要充分发展个人自由和人格自主的自由理想的潜能，但是我们需要将它们与另一些与之关联的说法区别开来，并将政治自由主义从其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密切关联中解救出来。

我认为，为了将多元主义的理念激进化并由此深化民主革命，我们不得不放弃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了解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多种形式的依附，也才可能为阐明异质的民主斗争（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等）提供一个构架。这并不意味着要拒斥理性、个性和普遍性的所有理念，而只是强调它们必须是多元的、没有固定的结

构，并且深陷与权力的关系之中。它只是表示政治总是以其复杂的形态存在着：不仅有“他们”的维度（建构对抗的方面），而且有“我们”的维度（构筑朋友一方）。因此，这种多元主义也必须与不承认碎片中有任何相对同一性的、后现代的社会碎片概念区别开来。我坚持的立场拒斥任何种类的本质主义——不论是关于总体的，还是有关要素的，声明总体和碎片都不拥有任何一种确定的同一性，认为并不存在那种先于它们偶发的和实用性的自我表述的同一性。

正是因为没有试图否定政治，所以，与那些受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构架熏染的、激进的或参与的民主观念相反，我在这里提倡的才是一个真正激进和多元的民主的立场。只有这个观念才能充分导出“价值多元主义”的含义，才能直面承认冲突对抗所产生的后果。站在这个立场上，冲突就不会被看作无法剔除的不幸骚乱，也不会被看作一种经验障碍——由于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与我们理性的、普遍主义的自我完全一致，因此和谐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对于一种激进多元的民主来说，认定冲突最终有可能获得解决的信念是危险的，即便把这种解决想象为向自由的非强制的交往这样一种调节性的理想的一个渐进过程（例如哈贝马斯）——而不是给民主的规划提供必要的界域——也是如此。

这种探讨的核心是意识到多元主义民主包含着一个悖论，因为它实现之时正是其解体之日。应把它设想为这样一种善，即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能成其为善。因此，这样的民主将始终是“将来到”的民主，因为冲突和对抗同时是其完全实现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条件。

第一章 激进民主：现代抑或后现代？

今天，站在左派立场上意味着什么？在20世纪的暮色中，唤起在社会转型规划背后的启蒙理想究竟还有没有意义？无疑，我们正在超越雅各宾派的幻象，这种幻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塑造了最近200年来的革命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多半不能从它所遭受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不仅极权主义的指责使苏维埃模式蒙受羞辱，而且新兴社会运动也对阶级还原论提出了挑战。然而，其内部对手——社会民主运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事实证明它已经不能满足近几十年来的新要求；其核心成就——福利国家——在右派的攻击下也难以为继，因为它已不能鼓动起那些本应通过维护这一成就而获利的人。

关于社会主义理想，问题似乎就在于与现代性的规划密切相关的进步这个观念上。在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一直关注文化问题的后现代讨论已经开始转向政治。使我吃惊的是，争论这么快就在一系列过分简单而又没有结果的地方僵化了。一边是哈贝马斯指责那些批判启蒙的普遍主义理想的人是保守主义，④一边是利奥塔哀婉动人地宣称奥斯维辛之后现代性的规划就已经被根除了。⑤理查德·罗蒂评论得很恰当：人们发现双方都非法地同化了启蒙的政治规划及其认识论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利奥塔认为要避免一种普遍主义的哲学就必须放弃政治自由主义，而与此同时欲捍卫自由主义的哈贝马斯不顾其所有问题依然坚持这种哲学的原因。⑥事实上，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和法

律的普遍主义形式的出现所表述的是一个不可逆的群体学习过程，拒绝它就意味着拒绝现代性，意味着掏空民主存在的基础。在《现时代的合法性》一书中，罗蒂建议我们考虑布鲁曼伯格对启蒙的两个层面的区分，即“自我肯定”方面（可以与政治规划联为一体）与“自我奠基”方面（可以与认识论规划相关联）。一旦我们承认这两个方面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就能够在捍卫其政治规划的同时放弃那种认为这一政治规划必须以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为基础的观念。

但是，罗蒂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将现代性的政治规划混同于一种既包括资本主义又包括民主的含混的“自由主义”概念了。而在政治现代性这个概念的核心，重要的就是区分自由和民主这两个传统。正如迈克福森所指出的，只有在19世纪二者才交接在一起，所以它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然相关的。而且，将这种“政治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相混淆也会是一个错误，后者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不断增长的背景中运行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民主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作出区别，如果像罗蒂所做的那样，一个人在自由主义的名称下将所有这些观念都合并了，那么，在捍卫现代性的借口下，他就会不得不为“富裕的北大西洋民主国家的制度和实践”^⑦做不折不扣的辩护，我们就再也没有通过批评（哪怕是内部的批评）促成其转化的余地了。

面对罗蒂所拥护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我想表明“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规划——E. 拉克劳和我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⑧一书中已经勾画出它的基本纲要——是如何计划对社会主义规划重新作系统表述的。这种社会主义规划避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两个共生的隐患，并向左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构想，一个既肯定伟大的解放斗争传统、又考虑到心理分析和哲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的新构想。实质上，这种规划既可以定义为现代的也可以界定为后现代的。它奉行那种“现代性的未完成的规划”，但是不像哈贝马斯，我们认为在这种规划中启蒙的认识论视角不再会有什么作用。虽然这种视角在民主兴起中的确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现在它却成为理解政治学新形式的一个障碍，这些新形式标志的是当今社会的特征，需要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视角才能加以探讨。因此就有必要使用哲学中可以称为后现代的诸多思潮所精心设计的理论工具，并借用他们对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的批评。⑨

民主革命

定义现代性已经有许多不同的标准了。依照每一个所要强调的特定层面和特征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拿我来讲，我就认为现代性必须在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正是在这里，社会关系才得以成形并被象征性地安置。就其肇始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而言，现代性可以被视作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点。在这方面，现代性的基本特性无疑是民主革命的到来。正如克劳德·赖弗特所表明的那样，民主革命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源发地，在其中权力被“空置”了。因此，现代民主社会被组建成“这样一种社会，其中权力、法律和知识都要遭受激进的非决定论者的折腾，社会本身成为一个不受控制的冒险的剧院；结果，任何体制化努力都无法完成，已知者因未知者而仍旧是不确定的，现在被证明是不可定义的”⑩。原本体现在王族身上并与超验的权威相连的权力的不在场现在制止了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和源泉；社会不再被定义为具有有机同一性的实体。延续下来的是一个没有明晰界定纲领的社会，一个其结构从一种简单的、普遍的角度无法加以描述的社会。正是以这种方式，民主才被刻

画成“确定性标识的消解”。(11)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式极具启发性，并且很有用，因为它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观察现代社会的诸多现象。因此，民主革命的后果可以从艺术、理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所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使人们能够以一种全新而又更具创造性的方式系统阐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以赖弗特所描绘的模样来看待民主革命，认为它是现代性的突出特征，那么很清楚的是：当他提及哲学中的后现代性时，他的意思就是认识到任何终极基础和根本的合法性都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社会民主形式的来临以及现代性本身都是由这种不可能性构成的。人们曾多次试图用奠基于人类及其理性中的基础去替代过去奠基在上帝或自然中的基础，这种尝试的失败使人们得到了上述认识。体现现代民主特征的激进的非决定论决定了这些尝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当尼采宣告上帝之死与人道主义的危机相关联时，他早已明了这一点了。(12)

所以，挑战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并非意味着拒绝现代性，而仅仅表示现代性内部的某一特定的规划——自我奠基的启蒙规划——的危机。同样，这一挑战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现代性的政治规划，这种规划毕竟是平等和自由的成果。为了承接和深化民主革命的这个方面，我们必须保证民主规划要考虑到我们时代的民主斗争的各个方面。正是在这里，所谓后现代批评的贡献开始发挥其所长。

实际上，如果我们固执地将统一的主体作为其行为的可理解性的终极源泉，那么，我们怎么还能希望去理解这些新的对抗？如果我们把社会行动者设想为同质和统一的实在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理解那些会影响到每一个个体的依附关系的多样性呢？构成这些新的社会运动的斗争特征的，准确地说，是构成某一单个行动者的主体地位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可成为对